

觉群 佛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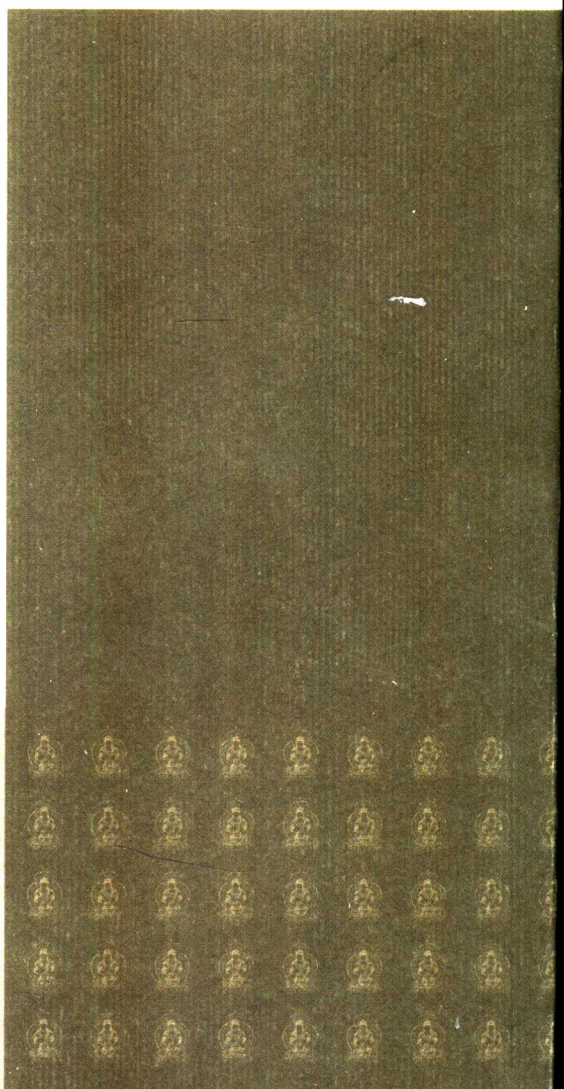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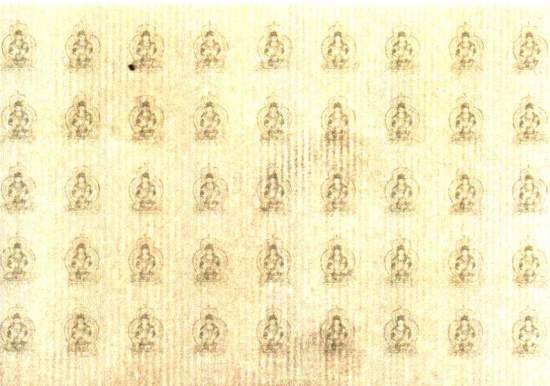
名誉主编 季羡林

主 编 觉 醒

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 谢和耐 著 耿 昇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觉群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 谢和耐 著 耿 昇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法)谢和耐著;耿昇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7-5325-3891-5

I. 中... II. ①谢...②耿... III. 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国-5世纪~10世纪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1755号

本丛书由觉群编译馆主持编译

责任编辑 罗 颢

觉群佛学译丛

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谢和耐 著

耿 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4 $\frac{12}{18}$ 插页 5 字数 438,000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7-5325-3891-5

B·471 定价:5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813

总 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 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

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不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二〇〇四年八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

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

《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再加上另外一个优秀品质:善于发明创造。这两种品质合起来,就创造出来了长达五六千年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放异彩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学习他人之长,包括一切方面。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论,同样有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任务。当然,在这里,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发明创造仍然居第一位。学习他人之长与发明创造,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蒙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楠、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学习语言的才能,决不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就有必要看别人的翻译。我常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鄙薄翻译之意,我深以为异。如果没有翻译,古代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如果没有翻译,欧洲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

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多,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之广度与深度日益加强,我们不可能广泛阅读所有原著,我们更有必要参看别人的翻译。这一

* 本序言是季先生为《敦煌吐鲁番研究译丛》专撰。尽管本书现已不再作为该译丛之一而出版了,但我仍不忍割爱,依然将季先生的大序置于卷前。多聆听老一辈的教诲,会使我们受益匪浅。

耿昇 2004年6月15日



点,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来说,更是迫在眉睫。这种学问是最近七十年以来新兴起来的。在过去,由于有广泛的国际协作,才能取得如此令人兴奋的成绩。今后这种协作只能加强,而万万不能削弱。特别是日本学者和法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必须继承老一辈学者那种勤于翻译的传统,更进而发扬光大之,否则要想开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新局面是决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出一套研究译丛。请一些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翻译介绍的同志们参加翻译。我们也希望,其他同行们在著作之余,也能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国外论著加以翻译,以飨国内学人;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更多,研究水平一天比一天更高。

季羨林

1984 年 8 月 1 日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与谢和耐教授的贡献

(代序)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法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创建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出版的敦煌学著述,以及涌现出的一批敦煌学专家,历来都颇受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是欧美敦煌学界一支富有传统和具有特色的主力军。

要介绍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我们必须追根溯源,追述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的西域探险及其劫掠中国文物的历史,以及由此而诞生的一门世界性显学——敦煌学的历史与现状。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共同形成了法国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的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三大汉学家名弟子。伯希和主要是语史学家,甚至是全才的“超级东方学家”;马伯乐除了历史和语言学之外,还注重于对道教的研究;葛兰言则更表现为社会学家,属于法国社会学之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之学派。顺便讲一下,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虽然也为沙畹的门人,但却是马伯乐汉学事业的继承人,而谢和耐教授又是戴密微的弟子,故从理论上讲他与马伯乐有师承关系,但他的研究方法与领域,却更接近葛兰言。

伯希和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既有语史学家的天赋,又有从事语史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与强烈愿望。他起家于法兰西远东学院,辉煌于法兰西学院的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为他专设于1909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死于癌症。他一生中著作丰硕、名震遐迩,成绩斐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1906—1908年的西域考古探险。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要追根溯源至此。这批西域与敦煌文献,甚至主宰了法国汉学一个世纪的研究方向。



一、伯希和西域探险的过程

1. 缘起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实,俄、德、瑞典、美、芬兰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探险的时间,要比法国更早一些。大英帝国借助于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伯在新疆作乱的机会,首先妄图染指我国新疆,于1834年派遣沃森(W. H. Wathen)赴于阗进行考察,约翰逊(W. H. Johnson)于1865—1866年考察于阗,沙敖(R. B. Shaw, 邵乌)于1870年考察叶尔羌与喀什,弗赛斯(T. D. Forsyth)及其同事们于1873年考察喀什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英国探险家贾斯理(Carey)和达尔格莱斯(Dalglish)稍后于1886—1887年也前往同一地区。鲍尔(Bower)少校利用一次追捕杀害达尔格莱斯的逃犯的机会,也于1889年到达沙雅。这一系列序幕导致了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于1900—1901年的第一次西域探险。

沙俄帝国不断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如普热瓦尔斯基(N. M. Przheval'skii),于1870—1885年4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作了考察。1885年,格伦伯切夫斯基(B. L. Grombëcevskii)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1890年间,佩夫乔夫(M. V. Pevcov)、罗博罗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达诺维奇(Bogdanovič)和柯兹洛夫(P. K. Kozlov)分别对喀什以及天山南麓、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帝俄驻喀什领事馆秘书雅·雅·鲁特斯(Ya. Ya. Lyuts)搜集了一大批中国新疆古文献并入藏于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贝林格(Belinko)和帝俄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G. Kolokolov),则将其搜集品入藏于帝俄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根据1891年11月28日的会议决议,而向彼得罗夫斯基发去了一份有关在喀什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科学考察的调查提纲。帝俄皇家科学院与考古学会,于是便在1897年派出由克萊门茨(D. A. Klementz)率领的考察团,赴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发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间3次赴西域进行考察。由格伦维德尔



(Grünwedel)、胡特(Huth)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1902—1903年首开4次西域探险之行。由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也于同时到达塔里木盆地。

在19世纪下半叶,也有几位法国旅行探险家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 E. Bonin)于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于1889—1894年,沙畹(E. Chavannes)于1907年,古伯察(E. —R. Huc)和秦神父(Joseph Gabet)于1843—1845年,多伦(d' Ollone)于1906年—1907年,邦瓦洛(G. 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 d' Orléans)于1895—1896年,都曾先后赴西域不同地点旅行探险。很明显,法国在西域考古探险起步较晚,人数较少。等到法国考古探险团远涉西域时,那里的几大重要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阗)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了,而且将文物精华劫掠一空。

西方列强在西域的科学探险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文物古迹的争夺,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他们于是便决定统一协调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组建起来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

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 1847—1928)任主席。塞纳尔出身于豪门富户,终生酷爱学术,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学家。他从1882年起便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士,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近30年,曾大力推动筹建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曾参与组织法国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探险活动,当时正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正是塞纳尔首先提议和鼎力推荐派遣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率团赴西域考察。

伯希和中选是由于他学识过人,又富有亚洲活动的经验,精通几门亚洲语言和拥有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识。该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原交州(东京湾)人路易·瓦杨(Louis Vaillant)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专业摄像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负责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工作。整个探险团所需大部分资金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



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赞助。诸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那样的一批学术团体,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先生那样的一些热衷于赞助文化教育事业的人,个个都慷慨解囊。从而保证了这次西域探险得以顺利成行。

2. 喀什地区与图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一经组建,便立即开始了在人员、资金、和设备方面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离开巴黎,走上了漫漫的近3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他们先乘火车,经过10天旅行后便经莫斯科和奥伦堡,最终到达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们在塔什干停留了1个多月,以等待其从圣彼得堡用船运来的大批行李设备。伯希和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以学习东突厥语。

伯希和一行乘火车前往安集延(Andijan),一路上沿富饶的费尔干纳河谷前进。8月11日,他们到达距安集延只有10多公里的奥希(Och),最终下了火车,开始组织赴喀什的马队。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人护卫队。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Emil Mannerheim),此人于1939年出任芬兰军队的元帅,于1944年又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当时他是奉沙俄的命令,赴中国西部刺探军情和掠夺文物的。后因“十月革命”而无法返俄,只好回归芬兰。他们结队而行,一直到喀什。马达汉实际上是利用伯希和探险团,作为自己进入中国的掩护和为此而提供方便。沙俄当局也正是以此为条件,才为伯希和一行提供各种方便和两名哥萨克人做护卫。

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间,率一支由74匹马组成的马队出发,仅供驮行李的马就达24匹之多。他们经过塔尔迪克达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尔克孜牧场前进,最终从伊尔凯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过俄中边界。他们再经过20天的旅行,最终于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

在喀什,俄国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将伯希和一行安排在俄国领事馆的一座建筑物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Macartney, 1867—1945,乾隆时代出使中国的英国公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之后裔)公爵也经常去拜访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驮队。瓦杨声称,伯希和在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中,都



很有“面子”，这是由伯希和的渊博学问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所赢得的荣誉。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 6 个多星期，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喀什东北的库车绿洲。在他们到达喀什时才获悉，德国人刚在库车作过发掘，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也曾在那里逗留。但在 1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该地区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 4 个点上，并对该地区作了地理测绘。

有关喀什周围的前伊斯兰教遗址。距喀什北部 15 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丝路要塞喀什的一处名胜。曾任清朝叶尔羌帮办大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和宁，于嘉庆九年(1804)所纂《回疆通志》卷七记载说：“回城北三十里上下……有清泉，甚甘冽，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洞中置石仙像。”这就是著名的三仙洞。在伯希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都曾对这里作过考察。伯希和于 1906 年 10 月 10 日从喀什发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他的这次考察结果。三仙洞位于从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 15 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经的地面上，于黄土高坡上开凿了三眼洞。在伯氏之前，第一个也是惟一个撰文描述过“三仙洞”的欧洲人，是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i)，其描述文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论丛》第 7 卷中：《喀什附近的一处佛教古迹》。彼得罗夫斯基为配合其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从大路一侧拍摄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绘制的一幅平面图。德国格伦维德尔探险团于 1905 年考察该洞时，巴尔图斯(Bartus)曾从山崖上用绳索滑入洞内。斯坦因第 2 次西域探险时，只作壁上观而未进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险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杨与努埃特，共同用滑车攀上了三仙洞。他们发现洞内的烧陶层是在原层被剥落之后，重新贴上去的，这应该是 1815 年的重修层。装饰和绘画风格都是汉地式的。洞中原来收藏的箭矢和木简，均被彼得罗夫斯基的卫队长带走了。洞中写满了游人题记，其中有汉人、蒙古人、满族人和突厥人等。赴三仙洞参考察的人具有各种不同信仰，除了汉满两族人之外，其余几乎全是兵勇。信佛者在这里有他们的“佛祖”，伊斯兰教徒则以摧毁佛教供像来实现自己的虔诚善业。木简证明这些洞子是于嘉庆二十一年九月(1816 年 10—11 月)，由清朝将军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题记写于 1788 年。所以，三仙洞的装饰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 18 世纪平定新疆之后完成的。努埃特拍摄了现在很少见的几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杨



对洞子作了全面调查,详细记录了洞口、中部、后部和左、右部各自的长度、高度和宽度。他还记下了洞内壁画内容,并录下了壁画题识和游人题记。

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玛克(Tchâqmâq)河南岸,便是图古曼(Tegurman)遗址。伯希和将该遗址考证为“水磨房”。彼得罗夫斯基未曾提到过该地区。1905 年的德国探险团和 1906 年的斯坦因,却都曾提起过它。斯坦因将该地名记作 Tigharman,后又改作 Khakan - ning - shahri,意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证清楚这个“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险中使用的地图上,却作 Khanlya,意为“汗城”。伯希和认为,该遗址群应断代为佛教时代和伊斯兰时代的建筑。伯希和亲自率领 10 名民工,对水磨房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

在从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大道的左侧,便是“旧城”,或“古城”(Eski - chahr)遗址。彼得罗夫斯基从未讲到过此一地,斯坦因对它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而已。伯希和认为应将它断代为穆斯林时代,但未对它作详细描述,只拍摄一批照片,并绘制了平面测量图。

对于喀什东北的汗诺依(Khan - öl, Khan - üi),也就是“汗宫”的著名遗址,伯希和作了重点发掘,特别是对其中“鸽子窝”(Kaptar - Khana)、萨喀尔墙(Saqal Tam)、哈萨墙(Hasa Tam)和“九间房”(Toqqouz - Hodjrah)等重要考古点,都作了发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对 3 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

第 1 个发掘点是“库尔干宰堵波”(Kourghan Tim),伯氏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斯坦因曾对该遗址作过考察并作了不太详细的记述。

第 2 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l - 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ümen)的交汇处,只有 3 公里远。

第 3 个是“小山”(Kichik - Debe),位于红山以西。

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âch)等处。伯氏特别是对炮台作了两天发掘。

1906 年 9 月 26 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



9月27日,他们在阿克噶什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yl-Tim),以及朶哈炮台(Qaqha Tim, Tim指“墙”或“窄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区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价值有限,虽然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如在炮台山发掘到一只巨耳造像。此外还有某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烧陶物残片。所有这些文物现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馆。

3. 图木舒克

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0月26日离开喀什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Ördeklik,野鸭地),在那里只搜集到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之后,于该月28日到达玛喇尔巴什(Mara-Bachi,今之巴楚)。他们于29日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当年12月15日,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型遗址群,因为在图木舒克村不远处,有一片完全被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认为它是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伯希和在该遗址中仔细地搜寻任何一种可为古建筑断代的标识。当他用马鞭梢无意地扒拉地面时,便发现了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是诞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过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缓慢地从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而传入中国中原,乃至远东的日本。新疆是这种传播中的一大中转站。图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1000年的佛教僧伽蓝遗址。这是在伯氏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和指出过的事实。该遗址事实上应被称为托古孜—萨莱或托乎孜—萨拉依(Toqqouz-Sarai,意为“九间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这项发掘工程以每天使用25—30名民工的速度展开,共持续6个星期。他们对该遗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测绘,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伯希和发掘到的文物,被运往法国后,先在卢浮宫展出,后又入藏吉美博物馆。

1906年9月至12月12日之间,伯希和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

图木舒克(Tumchouq, tumshuq)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鸟喙”,后来用于指崎岖不平的地势,具有指“岬角”的意思。此地即唐之拨换城或跋禄迦(Barukha)之故地。在18世纪时,则是指从南部的麦盖提(Markat)到北部的启浪之间的整个



巴楚(Bartchouq)地区。在穆斯林突厥人进入之前,该地名被用于指在玛喇尔巴什地区所操的两种近似于阏语的方言:一种为玛喇尔巴什方言,另一种为图木舒克方言。“图木舒克”这个地名既未出现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甚至也未出现在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1541—1547年)中。这是一个突厥文名称,但它似乎曾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出现过,作 Thum - šuk。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曾将该遗址断代为 4 世纪末或 5 世纪初。伯希和于 1923 年在《通报》中发表的书评指出,应将勒柯克教授提出的断代时间推迟 1—2 个世纪,他最后将其时代推迟到了公元 8 世纪。

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物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主要是在托古孜—萨莱(“九僧房”)发现的,包括仪轨供像和单独的雕像、浅浮雕和装饰建筑物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萨、天神、王公或下层世俗人、僧侣和苦修山僧等。其主体应断代为 6—7 世纪中叶。雕塑的主要材料是粘土和“柴泥”。其技术主要是模制。那里的壁画主要用于装饰寺院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其中的杂物可分为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或其他金属品、箭头、玻璃片、布帛、绳索和扫帚等)。它们现在均藏于吉美博物馆。

4. 库车绿洲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 1906 年 12 月 15 日离开那里,经阿克苏和拜城,于 1907 年 1 月 2 日到达库车绿洲。他们一行在库车共勘察发掘了 8 个月,直到 1907 年 9 月 3 日才离开那里,向乌鲁木齐前进。早在该考古探险团离开法国之前,他们就听说了有关库车“明屋”(Ming - uī, Ming - oīg, 千佛洞)的情况,洞中覆盖着 7—10 世纪的壁画,而且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均已先期光顾过。但先前几个外国探险团都过分地专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几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终在那里发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鉴、钱币、涂漆与彩绘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写本,特别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里,发现了很多用被称为“婆罗谜”文的印度字母书写的写本。它们都被运往了巴黎。

一直到 1907 年 4 月间,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库车周围地区。后来,伯希和制订了自己的考察提纲:踏勘和研究库木吐拉千佛洞,这批佛洞开凿于木扎提河



(渭干河)左岸的雀离塔格山山口的崖壁上;考察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 - Âqour),那里有在木札提河以西平原中建造的寺庙遗址;然后再前往苏巴什(Soubachi),那里有数座寺庙和寺庙遗址。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庫木吐拉停留;然后又交叉地发掘了都勒都尔—阿乎尔(4月17至8月5日),绘制了一幅考古遗址平面图,发掘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早于9世纪的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他们一行于6月10日至7月25日,又对苏巴什作了发掘,也获得了彩绘木盒、雕塑像残片与壁画等。

伯希和一行在庫车地区考古探险时,以唐代礼佛取经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导游手册。玄奘于630年经过屈支(库车)国,并对昭估釐二伽蓝作了记述。伯希和根据玄奘的记述,曾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寄托过很大希望。伯氏将都勒都尔—阿乎尔寺和苏巴什宗教双城比定为阿奢理貳(屈支语,意为“奇特”。但伯希和不知为什么又读作“阿奢理膩”)大寺和昭估釐二伽蓝。

1907年5月28日,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了其29岁的生日。这一天,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对这片遗址的发掘,清理了最后一个垃圾坑,获得了一大批文书残卷。

伯希和一行6月10日到达苏巴什,一直逗留到7月24日。这个考古点位于库车以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处雀离塔格山脚下和库车河出口处。各占地近1公里的二僧伽蓝便分别位于该河的两岸。

伯希和留下了分别写于1907年4月17日至6月4日和6月6—18日的一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的发掘工作和所获得的文物。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每天雇佣25名民工,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动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对所有遗址都作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主要是对佛教精舍、寺院与山口、中央大院、阿兰若、僧伽蓝的侧院、中心窄塔波、甬道等进行发掘。伯希和根据文书和钱币,而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断代为初建于公元4世纪,活跃于8世纪,停废于11世纪。在苏巴什的“壁画屋”,伯希和对于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乐器、金刚与钵、装饰图案、建筑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研究。

伯希和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带回法国的物品,现在均收藏于吉美



博物馆。其中主要有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粘土和陶土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用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品、印鉴、陶器和杂物。属于苏巴什的则有木制品、金属和各种原料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5. 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与谪居的中国文化名流的交往

伯希和在考察天山道路后,于8月24日返回库车。他们在库车的考古发掘已宣告结束。1907年9月3日,他们一行携带自己发掘和搜集到的文物,离开库车,前往新疆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乌鲁木齐。他们经过轮台(Bourgour)和库尔勒(Kourla)绿洲,一直到达焉耆(Qarachar,喀喇沙尔)。他们3人从那里开始分道而行,努埃特率领满载文物的车队直至乌鲁木齐。伯希和再返回库尔勒,沿一条山间小道直到喀喇苏(Kara-sou,黑水,今阿拉沟),然后再沿河谷而上,一直到达托克逊(Tuksoun)。他在河谷中考察了多处佛教遗址,特别是在和硕—布拉克,它们均由格伦维德尔探险团考察过。伯希和在10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瓦杨则于9月14—24日之间,始终逗留在焉耆,于博湖附近搜集各种动植物标本。他还完成了多次天文观察,特别是于一夜间对3次星辰掩始的观察。瓦杨还根据伯希和的命令,也从焉耆前往托克逊和吐鲁番,以查看在德国人发掘过的遗址上,是否还会有所收获,他于10月6日离开吐鲁番,于9日在俄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馆中与其同伴们相会合。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10月9日至12月24日逗留在乌鲁木齐,这本来是为了等待将他们的俄国钱币兑换成中国钱币。由于藩台鼎力相助,他们才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伯希和不仅与新疆的藩台、抚台与绥台保持着友好往来,而且还与当时新疆最著名的中国文人交往甚笃,这些文人大多是遭清政府流放而谪居新疆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又与义和团有关,当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外国公使馆时,伯希和正在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处供职,并且曾与义和团直接正面冲突,甚至还夺取了一面义和团团旗,伯氏终生以此为荣。此旗至今仍存在法国巴黎的荣誉军人院或称残老军人院(Invalides)中。

居住于乌鲁木齐的被发配流放的那些流民、旧官吏特别引人注目。除了那些因触犯普通法而被判刑的流犯外,清朝政府还向乌鲁木齐地区发配了不少因